

河南地方志丛书

方城县教育志

《方城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

中州古籍出版社

序

编纂新志书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方城县教育志》的出版问世，无疑是方城县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它不仅为方城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而且“鉴往知来”，“资鉴垂训”，它将在今后的方城教育事业发展上显示出不可低估的作用。

方城为中州古邑，有四～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往的州、县志为我县文化教育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但这些志书中教育部分极其简略，且有不少封建糟粕。今天的《方城县教育志》依据教育的发展实际，真实地记述了方城县教育的源远流长、盛衰起伏，科学地体现了教育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无疑是份宝贵的史志资料和一部教育科研参考书。

《方城县教育志》的编纂受到了中共方城县委、方城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省、地教育部门的领导，尤其是省、地教育史志编辑室、县志总编室的领导，在百忙中给以具体指导，这是修好本志的前提。纂修过程中，由于体制改革中教育局和一些学校领导成员的变动，编志领导几经变换。原编委主任包彦田、副主任高元璋、前任教育局长杨根立、副局长斯光洲，都分别在组织队伍、资料征集、统稿和修改中做出了突出成绩。本志编辑室的同志更是热情工作，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还有许多参与此项工作及为本志提供宝贵资料的同志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借此，我们代表教育局党委和全体领导成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切盼读者对本志的缺陷和不足不吝赐教。

中共方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局党委书记 郭岚松
方城县教育局局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组长 宋长耕

1990年10月25日

前　　言

振兴中华，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把教育列为发展经济的战略重点和建设两个文明的基础，把发展教育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观今要鉴古，发展教育不能割断历史。方城县地处中州南北通道，历史悠久。它的教育虽称不上发达，但也有其发展的个性特点。汉代，地方官立、民立学校“次第备举”，那时亦将教育发展作为“巩固国家之根本”。我们今天修志，从本县的历史实际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古代和现代的教育史料加以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我们现实的教育及今后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1984年3月，在中共方城县委和政府的关怀下，在省、地、县修志部门指导下，方城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并开展了工作。几年来，教育局领导重视、支持编辑室的工作，编辑室的同志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进行编写，于1987年夏完成了初稿的写作任务；经过单位领导和本县知名教育行家的评审，又做了数次修改，至1987年底，纂成此稿。

纂修过程中，在搜集资料期间，王延波、王长明、赵洪林等同志和各高、完中，各乡镇参与此项工作的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提供了不少很有价值的资料，在这里一并致谢。

编写社会主义的教育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由于资料不足和水平的限制，错误、疏漏之处实所难免，还望专家、学者、同行和各届人士批评指导。

方城县教育志编辑室

1988年3月

编辑说明

一、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针，充分运用史料，反映方城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继承历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目的，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以期起到“存史、资治、育人”的作用。

三、本志上限起自尚古，下限至1985年，详今略古，以新中国建立后36年为重点。

四、本志包括志、记、传、述、图、表、录，以志为主；概述、大事记宏观排列；事业发展，采取分门别类，横排竖写，以章统节。

五、对各时期政权，按习惯称呼，不加政治性的定语。对历史纪年，1912年前按当时通用称谓，在括号内注明公 元 年 份；1912年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六、对人物直写姓名，一般不加褒贬之词。

七、解放初期，方城西北部分区、乡曾属鲁南县管辖。1951年9月，南阳县的博望、柳河二区划入方城县，疆域归属时限不一，故记事和统计数字以原方城县所辖乡（镇）为主。

八、本志资料来源，以文献资料为主，口碑资料、特约稿件均经反复核实，旧志中的错误部分，改正后，附有更正说明。

目 录

概述	(1)
大事记	(10)
第一章 儒学、书院	(33)
第一节 儒学.....	(33)
第二节 书院.....	(35)
第二章 社学、义学、私塾	(38)
第一节 社学.....	(38)
第二节 义学.....	(39)
第三节 私塾.....	(40)
第三章 普通教育	(43)
第一节 概况.....	(43)
第二节 幼儿教育.....	(50)
一、设置.....	(51)
二、管理.....	(53)
三、学制、课程.....	(54)
四、教学.....	(54)
第三节 小学教育.....	(56)
一、设置.....	(56)
二、管理.....	(67)
三、学制、课程.....	(73)
四、教学.....	(75)
五、典型学校介绍.....	(89)
第四节 中学教育.....	(98)
一、设置.....	(98)

二、管理	(103)
三、学制、课程	(107)
四、教学	(108)
五、典型学校介绍	(118)
第五节 半耕半读教育	(126)
一、耕读小学	(127)
二、耕(工)读中学	(131)
第六节 思想政治教育	(133)
一、课程开设	(133)
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134)
第七节 中小学体育	(145)
一、体育课	(145)
二、课外体育活动	(148)
三、体育代表队和体育运动竞赛活动	(149)
四、劳卫制与体育达标活动	(151)
五、体育场地	(153)
第八节 学校建设和电化教育设施	(155)
一、房舍、校具	(155)
二、仪器(教具)、图书	(160)
三、电化教育设施	(162)
第四章 职业教育	(163)
第一节 概况	(163)
第二节 师范、进修、函授	(164)
一、师范传习所、师范学校和师范班	(164)
二、教师进修班与教师进修学校	(166)
三、教师训练班	(169)
四、各级师范函授	(170)
第三节 各类职业学校	(174)

一、阴阳学	(174)
二、医学	(174)
三、河南省私立尚志高级文书科职业学校	(174)
四、方城县农业技术学校	(175)
五、方城县林业中学	(175)
六、方城县蚕业技术学校	(176)
七、方城县工人技工学校	(176)
八、方城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177)
九、方城县农业机械技术学校	(177)
十、方城县戏曲学校	(178)
十一、方城县农业广播学校	(179)
十二、农职业高中	(180)
第五章 成人教育	(182)
第一节 社会教育	(182)
第二节 民众教育	(183)
第三节 成人文化技术教育	(185)
一、干部、职工教育	(185)
二、农民教育	(192)
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201)
第六章 考试制度	(202)
第一节 科举考试	(202)
第二节 升学与招生考试	(205)
第七章 教师	(211)
第一节 任用与管理	(211)
第二节 经济待遇	(221)
一、工资(束修、薪俸)	(221)
二、福利	(228)
第三节 政治地位	(230)

第四节 民办教师	(234)
第五节 教师节	(237)
第八章 教育行政	(240)
第一节 教育宗旨	(240)
第二节 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和演变	(245)
一、县级教育行政机构	(245)
二、乡(区、社)级教育行政机构	(260)
第三节 管理体制	(265)
第四节 教育经费	(267)
第五节 勤工俭学	(292)
第九章 党、团组织与教育工会	(298)
第一节 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298)
第二节 青年团组织	(300)
第三节 教育工会	(301)
第十章 人物	(308)
第一节 传略	(308)
第二节 人物简介	(322)
第三节 名表	(339)
第十一章 附录	(367)
元玄观道士姚瑞祥捐资兴学情形文附批(1908年)	(367)
方城县教育视察报告(1930年)	(368)
河南政治视察报告——方城(1936年)	(377)
博望“子瑞中学”碑石(1944年)	(386)
豫西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指示(1948年)	(387)
豫西行政公署指示(1948年)	(389)
方城县教育局公立小学调整布局工作方案(1965年)	(390)
中共方县委关于调整高、初中布局的意见(1980年)	(395)
方城县中小学教学责任制试行草案(1983年)	(397)

方城县教育局文件（1983—1984年）	（403）
教师发表的著作篇目辑录（收至地区以上报刊）	（410）
1986—1990年方城教育纪事	（413）

概 述

方城县地处中原，古为豫州之域，西周为鄖国，秦置阳城县，汉改堵（者）阳县，北魏置方城县，金置裕州。明废县置州，民国复改方城县。新中国沿用方城县名，1985年辖15个乡（镇），居民853310人。

方城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勤劳勇敢的先民们，即在方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县境张庄、平高台等11处文化遗址表明，方城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经历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几个阶段，已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其教育始于何时，虽无文字记载，但大量出土文物表明，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原始教育形态早已存在。春秋末期方城已是繁华城市。楚惠王三十二年（公元前457年）至秦时，方城为阳城君封地。境内“夏路”纵贯南北，由今之大关口向北直达黄河流域诸国。这亦表明，当时方城的文化教育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西汉文帝时，法治学家、廷尉张释之；东汉光武帝时，古文经学家、特招公车尹敏；三国魏明帝时，冶铁家、司徒韩暨；他们均出生于堵阳，就学于乡里，博学卓识，成名报国，没有家乡的昌盛教育为基础，是决不能成为栋梁之材的。古代名人学士来访方城或途经游憩而进行交流者不少：孔子使子路问津于方城山，说明他们周游列国讲学曾至；唐代大诗人李白、北宋诗人兼书法家黄庭坚、明代尚书于谦、金代文学家元好问、清代政治家林则徐、诗人兼书法家何绍基等，都留有佳作名句。这些启迪方城县文化教育的名作，至今铭载史册。

汉代地方官学“校庠序”的发展，为唐代教育奠定了基础。隋唐统一中国后，大力振兴儒学，在重视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同时，提倡佛道及百家学说。三教争相发展中，方城文化和科学技术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至宋、元时期，因这里地处要塞，征战频繁，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其后教育则盛于明朝。

明洪武三年（1370）知州缪乘先改建儒学，“盖崇先师而隆教养也”。八年（1375），“各关、乡俱设”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方城教育日隆，一度有“甲第蝉联”之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在教育方面，特别是河南教育，一个时期无大变化。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影响所及，方城义学有所发展，毁神占庙兴学者居多。以后废科举兴学堂，改良私塾。方城在办学革新运动中，无论是在教育思想上，还是在教学内容上都经历了进步与倒退、爱国与卖国、奴化与反奴化、专制与反专制的斗争。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方城高、初等小学堂8所，师范传习所1所相继建立。其后，简易识字学塾达到23所。学堂的革新，学校教育的创立，比以封建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旧教育进了一大步。但在教育内容上除一部分近代科学知识外，所谓“中学为体”的讲经、修身等科目仍充斥着封建内容。学校体系、课程、教材、教育行政组织都是抄袭外国（主要是日本），不切合中国实际。

中华民国成立后，废除清代学部，建立教育部；废除小学读经科，各类学堂和堂长改为学校、校长；批判了封建主义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教育宗旨。这些进步措施，在实施中遭到袁世凯的“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复古方针的干扰。方城在这一时期的学校基本仍同清朝末年一样，并无大的进展，私塾仍是遍设城乡。1914年建立的师范传习所，1918年建立的女子小学，1925年建立的模范小学和县立初级师范学校，均

于1926年军阀混战的战火波及方城时停办。1930年，方城县教育有所发展，1933年，全县学龄儿童共有72525人，入学儿童（包括入私塾）12143名，失学儿童60377名，与邻县教育相比仍属落后。1936年全县的县立、区立，高、初级小学达到122所，私立教会小学5所，在校学生5601名；私塾116所，在校学生2122名；初中1所，学生37名；简易师范1所，学生51名。

民国以后，方城县教育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除旧的教育制度外，还在于教育经费困难。全县学田操纵在城内绅士手里，给收租、增租造成困难，就是教育基金生息数千元，教育局也无权过问。再加上地方的派别明争暗斗，这对教育事业也是极大的摧残。

抗日战争时期，方城县的教育一度发展，是学校数量多、质量较好的时期。其原因：一是人们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觉悟空前提高，人们能够认识到振兴教育即是振兴民族的必由之路和救国救民的大计；二是抗战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学生不抽壮丁（缓役），家长为让孩子躲壮丁而上学的不少；三是学田不交苛捐杂税，四是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在方城县大量置买田地，他们为了掩盖其贪污剥削面目也出资办学，如明德中学、子瑞中学等；同时还有一些地方绅士、地主捐献土地办学，如澧阳中学、方南中学、新裕中学等，再加上开封沦陷而迁入的私立河南高中、尚志高中等。据1945年统计，在这阶段，全县高初级小学在校学生40841人；中等学校共发展到9所，总计在校学生1475名。中、小学在校学生分别比抗战前增加7倍多、16倍多。

伟大的抗日战争，也是一场民族斗争。抗战一开始，中共地下党南阳特支即派员到方城开展工作。1938年2月中共方城区委成立。在地下党的领导之下，各级学校师生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不断发展。10月中共方城县委成立，继而方城师范、独树小学、师范附小等校建立党支部。抗日宣传活动遍布城乡，不少中、小

学师生充当了宣传骨干，尤其是中学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国家培养输送了一批优秀干部走上抗日前线，为巩固发展方城抗日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在民主运动中，师生的阶级斗争觉悟提高了，既抗日又打击土顽势力，培养与锻炼了大批青年学生，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准备了人才，输送了人才。1945年8月14日，日本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各级政权机构恢复，学校陆续开学复课。次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重庆和谈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举世闻名的解放战争开始。这时，各级学校在方城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斗争。

1947年11月6日，方城解放，11月中旬，方城县人民民主政府成立。之后，许多在家赋闲的知识分子，在参加县委和人民政府主持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后，认清了政治形势，接受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积极出来参加工作，参加教师队伍。1948年2月，古庄店、拐河、孤石滩、独树完全小学先后复学，农村小学相继开学上课；至12月方城县有完小7所，乡小49所，计85班，学生2188人，教师93人。1949年9月，全县完小发展为19所，71班，学生3451人，教师106人；乡小78所，201班，学生9009名，教师229人；初级中学1所，6班，学生220人，教职员19人。这一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大后方紧跟全国形势，开展大宣传、大支前，方城县教育战线紧密配合，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和做好支援前线工作，动员青年学生参军参战，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为全国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城县的教育事业从制度、内容到方法都进行了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革，迅速建立了以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培养为国家建设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才、巩固发展人民民主专政为主要任务的新教育。30多年来，教育在改革中发展，在提高中前进，取得了很大成就，也走过曲折道路。1950到1956年，是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国

民经济处在三年恢复三年初步发展阶段，在校舍、师资、设备等各方面都很差的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大力倡导与支持兴办教育事业，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是迅速的、健康的。1950年全县共有小学250所，656班，学生27582人；中学仅有1所，8班，学生150人。至于教学辅助设备，如仪器室、图书室和体育活动场地、器材等，则几乎是一无所有。但到1956年，全县公办小学在校学生增加47%，民办小学15所，在校学生530人；新建了6所初中，在校学生达1428人。1952年全县共组织起不同形式幼儿教育设施110所，入园儿童达3500人，以后随着这一时期的经济恢复与振兴，逐年有所发展。工、农业余教育大力发展。1950年底全县共办起冬学982班，入班学习的农民26715人。1953年冬学转为常年民校，到1956年民校增至3464班，学员达146362人，其中当年达到毕业《脱盲》标准的18925人。职工夜校也迅速兴起，在职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尤其是县城，组织有扫盲班、高小班、初中班，坚持常年学习。国家投资的教育经费，1953年以前由地方公粮附加解决，到1956年改为县财政拨支，全年金额1088355元。

这一时期，团结、教育、改造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提高了广大教师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觉悟，使广大教师改变了思想面貌，焕发了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献身的热忱。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和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教育界广大教职员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曙光即将到来，这就更激发了广大教职工热爱新中国教育事业的激情，牢固地确立了人民教师的地位，确立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权，使中小学教育和社会成人教育都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开创了方城教育史上的新局面。

1957年至1965年时期，由于“左”倾思想指导下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方城教育在折腾中曲折发展。1957年初，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加强了党对学校教育的领导，加强了中小学的

思想政治工作。但至秋冬，全县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全面展开，直到1958年冬，这场“斗争”才基本结束。在这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中，伴随而至的“大跃进”，浮夸风兴起，批判知识分子“白专道路”的斗争接踵而来，“拔白旗，插红旗”，“反右倾，打暮气”，把教师搞得人人自危，大大伤害了他们的心，损害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给教育事业造成了不良后果；教师和学生走出课堂，参加大炼钢铁、深翻土地、种高产试验田等社会生产劳动，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继而在全日制学校里，又掀起了教学大搞群众运动 对教材实行“留、砍、换、补”，语文、数学双百分和双百班竞赛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民办中小学的“大办”高潮也迅猛而至，疾速铺开。职工、干部和农民教育也不甘落后，红专大学、艺术院校、“十二家”（艺术家、歌唱家、文学家等），“一天一夜扫除文盲”等等都出现了。表面看教育革命成绩不小，其实严重脱离客观实际，盲目发展，违背教育与经济相互发展的规律。用劳动代替教学，收效甚微。这样轰了二三年，乱了一大阵。实际这一时期出现了方城解放后教育事业发展中的第一个低潮。

1961年至1965年，按照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方城县对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使1957—1960年工作中的某些错误得到纠正，教育事业才又纳入新的轨道，健康地向前发展。1962年，全县中小学调整后，小学为339所，1592班，初中8所，45班，在校学生1592人；高中1所，12班，在校学生310人。1962—1963年，全县中小学贯彻“小学四十条”、“中学五十条”，从正反两方面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伤害教师积极性的“左”倾错误，使全县教育工作转向稳步发展。在恢复、建立以教学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秩序中，提高了思想觉悟水平的教师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教学质量的提高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尤其是1963年，推行两种教育制度，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耕读学校大发展。1964年全县小学调整布局后，仅二年

时间，半耕（工）半读学校，就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给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和服务工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1965年半耕（工）半读中小学遍布城乡，计有1845所，1884班，在校学生达28319人。耕读中学专业性较强，有林蚕、农技、农机、财会、人医、兽医等。这期间，方城县教师进修学校充分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全县培养了一大批较为合格的教师，给提高学校教学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各类各级学校教师工作积极努力，学生学习刻苦勤奋，教学质量稳步提高。在1963—1965年，方城一中的历届高考成绩稳定在全专区上游，毕业生除少数就业外，绝大多数升入大专院校学习。

1966—1976年的十年动乱，给教育事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方城县教育战线的十年经历也是这样。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全国批判“文艺黑线”的高潮中燃烧起来了。6月，县委根据党中央“八条”的精神，组织工作组派进了方城一中，9月即被迫撤出。红卫兵的兴起，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和揪斗“牛鬼蛇神”运动。从此，“夺权斗争”、“停课闹革命”、“大串联”、批“逆流”、反“黑风”，大抓“走资派”，搞乱了学校，摧毁了设施，损伤了教师的人格，摧残了被害者的身体。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侯振民、王庆余关于把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后，县内90%以上的外县籍教师回了原籍，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是在群众的监督下的劳动改造，大大伤害了教师的自尊心和责任感。全县教育系统出现了“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969年以后，在中央三令五申复课闹革命和整个形势的影响下，方城县各所学校陆续复课，但“斗争”还在继续深入，“批林批孔”、“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学朝农、迈大步”，风暴一阵紧一阵，斗争一个接一个。这种无休止的折腾，无休止的斗争，使全县教师队伍频遭摧残，教育事业横遭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学生不仅没有学到

知识，而且政治思想、道德水平下降到惊人地步。违法违纪行为大大增加，有的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产生迷惑和动摇。这期间，方城县的大多数教师、教育行政干部、职工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教育战线的倒行逆施是坚决抵制和斗争的，特别是1972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时间里，人心所向，全县教育工作逐渐有了转机，可是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而又制造混乱，这就更激起广大师生的强烈反对。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全县教育系统，通过拨乱反正，批判“两个估计”、“两个凡是”，恢复“文革”前实行的统一考试、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对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动乱制造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教育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城教育事业的发展被列为方城县经济发展规划的战略重点之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相应得到解决，教师地位空前提高。为了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全县576名中小学教师的家属计1926口人依照政策进行了“农转非”（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的城镇人口）。社会上尊师重教的风气正在形成。1985年公、民办教师队伍发展到7250人，是1949年的32.55倍。教育事业费的投资由1978年的2892700元提高到1985年的5846000元。1980年开始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明确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教育事业的规律。通过进一步调整教育结构，使全县中小学的分布趋于合理。1985年全县共有小学492所，3234班，在校学生 125301人；初中97所，464班，在校学生21017人；普通高中 6 所，45班，在校学生1982人；农职业高中 2 所，10班，在校学生440人。按照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要求，在教育体制改革中，中